

奥巴马第一任期的中美关系

余万里 肖河

2009—2012年，奥巴马执政第一任期的中美关系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一度对与中国的合作寄予期望，但中美关系最终失去了“合作共赢”的机遇。随后，中美国绕经贸、汇率、对台军售、达赖与人权、朝核等传统问题的斗争持续不休，安全与军事互信持续恶化。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出台，围绕东海、南海领海争端的斗争成为中美之间新的博弈领域。2012年，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力图超越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在两国力量结构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一理念要在现实中落实还需要双方付出巨大努力。

关键词：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 重返亚太战略 新型大国关系

2008年11月14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297张选票的压倒性优势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方面源于共和党布什政府八年执政累积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反恐与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另一方面则由于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雪上加霜。因此，当时的中国学者普遍对中美关系的走向表示乐观，虽然不免担心民主党上台会带来经济和人权领域的摩擦，但认为处于伊拉克和金融双重危机中的美国将更加需要中国。后一个趋势在奥巴马的“总统准备期”也占据了主流，美国前总统卡特在赴北京参加中美建交30周年的活动时带来了奥巴马进一步增强双边关系的期望，布热津斯基等前政要甚至公开提出要建立中美“两国集团”（G2）。^[1]

余万里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肖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Obama Vows to Boost Sino-US Relations, Says Carter”, *China Daily*, 2009 January 13.

2009年：“高开”

历史上，美国选举周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历来是“低开高走”，总统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通常在任期开局采取对华强硬的姿态，随后推动中美关系步入高潮。奥巴马的当政打破了这个规律，不仅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而且积极推动双边合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国内在人权、经贸等问题上的政治诉求，使中美两国关系达到新的高潮。

（一）“同舟共济”

2009年2月15日，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踏上了上任后的第一次亚洲之旅。一贯强调人权问题的希拉里不顾美国国内人权分子的批评，公开声明不会让这类话题“干扰”此次她与中国领导人探讨如何合作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1]在出访前夜，希拉里在美国亚洲协会上引用中国成语表示中美应当“同舟共济”。希拉里带到北京的主要关切是经济合作和气候变化两大议题。奥巴马政府寄希望于“清洁能源革命”，一方面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又树立起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的形象。正因如此，《纽约时报》戏称希拉里在出行前就已经将“中国之行”粉刷成了绿色。

在希拉里展开出访攻势前，中国对奥巴马政府仍然存有疑虑。一方面对于希拉里在国会提出“巧实力”概念感到疑惑，另一方面对新任财长盖特纳（Timothy Franz Geithner）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感到不满。^[2]但是希拉里第一次出访的姿态仍然获得了中国的肯定，胡锦涛主席称赞希拉里一上任就访问中国，温家宝总理则表示非常欣赏“同舟共济”这一说法。外交部长杨洁篪也在会谈中重申了希望两国能够推动将在当年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达成协议。^[3]这次访问在一些原则上达成了一致：第一，中美达成了让战略经济对话（SED）“升级”的目标，在升级版的对话机制中，美方将由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作为共同主席，名称也改成了战略与经济对话（S&ED）。^[4]第二，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

[1] David Eimer, “Hillary Clinton China Visit Blamed for the Detention of Activists”, *The Telegraph*, 2009 February 21.

[2] “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人民日报》，2009年1月31日。

[3] “外媒：中美合作成希拉里访华主调”，新华网，2009年2月22日。

[4] “Dragon TV Interview: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Dialogue With China”, Remarks by Secretary Clinton: February 200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方面，双方希望加强在相关产业、技术上的合作，使之能够成为两国合作“最乐观的领域”。^[1]第三，在经济方面，双方都认为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和扩大，中国关于美元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关切得到了希拉里的积极保证。

双方都对此次访问进行了高度评价。美国媒体认为希拉里此次出访态度“谦卑”，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向中国求援的必须之举，一时间学习“同舟共济”等中国成语成为美国媒体的一大热点。3月12日杨洁篪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系统阐述了中国在“中美合作应对挑战”上的立场，他强调中国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稳定自身经济发展速度，愿意和美国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愿意在节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但是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推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同时强调了美国应当尊重和照顾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无论是台湾还是西藏问题均属此列。^[2]这一态度也说明，尽管中美双方都希望加强合作，应对的也是共同的挑战，但是两国合作政策的步调仍然不尽一致。

历史上，由于受大选的影响，美国新一届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经常表现为低开的规律。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关系则一反常规地呈现高开的局面，双方在一开始都表现出积极推动合作的期望。虽然在中国外交部长访美的前一天发生了中美两国军舰在南海对峙的无暇号事件，但是杨洁篪在美国的发言并没有对此做出批评，这也显示出了双方淡化负面事件的共同方针。而美方虽然认为其飞机和舰艇有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3]但是其在军事磋商中，主要还是探讨中国在阿富汗发挥更多作用的可能性。^[4]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内，中方是在“淡化矛盾”，而美方则显得“充满期待”，在诸多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营造出了一种“同舟共济”的氛围。

2009年4月1日，胡锦涛和奥巴马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实现了首次会谈。双方正式确定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确定王岐山、戴秉国分别作为负责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希拉里和盖特纳分别作为负责

[1] “Dialogue on U.S.-China Partnership on Clean Energy”, Remarks by Secretary Clinton: February 200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 “杨洁篪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2009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3] Captain Raul Pedrozo, “Close Encounters at Sea: The USNS Impeccable Inciden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09, Vol. 62, No. 3.

[4] Alison Klayman, “US, China Hold Military Talks After 5-Month ‘Pause’”, *Voice of America*, 2009 February 28.

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的美方代表。会谈透露的信息是两人一致强调增进中美双边关系、加强合作。在4月2日的峰会发言上，胡锦涛主席更是以“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为题发表讲话，尽管其内容主要关于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和建议，但这一标题本身暗示了对美方的回应。^[1]

（二）“战略再保证”

金融危机后这种中美协调一致、关系热络的局面也使得美国学界产生了很多新提法，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an）、基辛格（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和布热津斯基（Henry Alfred Kissinger）提出的“G2”最为知名，这些概念不仅强调了美中之间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甚至提出了美中两国共治的说法。中国对于这一思潮的反应较为复杂，直到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赴布拉格参加第11次中欧峰会时才做出了公开回应，表示“我们不赞成中美共治”。^[2]这也表明，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提升”仍有不少疑虑。

美国在强化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在着手展开奥巴马“重返亚洲”的战略。希拉里首访亚洲就包括了印度尼西亚，意在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6月10日被正式提名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在国会听证时表示，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太平洋国家”。^[3]7月15日，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马希尔也在听证时表示“维护东亚水路的稳定、自由航行和合法商业活动的权利是美国的核心利益”。^[4]

此时美国国防部仍然对年初的无暇号事件耿耿于怀，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谢尔更是宣称要用“言辞和行动”来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姿态，宣示在这一地区的自由航行权，建立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并且用军事交流机制加强与中国的沟通以降低“误判”的风险。^[5]民主党参议员、

[1] “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2009年4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 “‘G2’的提法不妥”，新华网，2009年5月25日。

[3] Kurt M. Campbell, “Testimony, Nominee for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une 10 200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4] Testimony of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Scot Marciel,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15 July 2009.

[5] Testimony of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Scher, Asian and 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15 July 2009.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分委员会主席韦伯（James Henry Webb）在8月下旬访问越南时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应运用自己的外交地位、国家地位以及国家意志来形成在这一地区制衡而非对抗中国的力量。”^[1]不过，在2009年时，美国还是将与中国的合作放在了更为优先的地位，因此美国官员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或是东盟外长会议时也都没有讨论领土问题，更没有指责中国。^[2]

7月27—28日，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按照计划在华盛顿召开，重点探讨了如何在经济和环境问题上的合作。经济方面，美国承诺提高自身的储蓄率，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完善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则承诺提高消费对整体经济的贡献，与美国共同承诺进一步开放投资市场。环境问题方面，两国草签了加强能源气候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均表现出了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合作的强烈兴趣，同意建立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美国国务院、能源部主导的联合机制。地区问题方面，中国承诺在朝鲜核问题、阿富汗、伊朗和苏丹问题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维护区域稳定。双边关系方面，中美双方确定这次会谈已经为奥巴马总统年内访问中国打好基础，双方将扩大军事、人文交流，并且重开人权对话。^[3]

然而在各种机制建立的同时，中美两国在“新领域”的合作却并不顺利，比方说中国对在阿富汗加强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就显得非常迟疑。美国从2月份起就通过大使馆向中国正式提交了通过中阿边境的瓦罕走廊向北约部队提供补给的建议，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4]9月14—15日的反恐磋商中，中国转而将重点放在要求美方在反恐合作中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5]这种做法既是对美国对东突恐怖分子实行双重标准的不满，也反映了中国对于美国推卸在阿富汗等地区反恐责任的疑虑。9月22日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做发言的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奥巴马时，也明确提到希望美方理解和支持中方打击以“七五”事件为代表的暴力恐怖犯罪、不允许“东突”分裂势力利用美国领土进行活动，但是奥巴马仅仅回应道“美国坚持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6]

[1] “In Vietnam, Webb Says U.S. Must ‘Balance’ China”, VOA News, August 20, 2009.

[2] “Remarks at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Remarks by Secretary Clinton: July 2009, U.S. State Department, 2009 July 23.

[3]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新闻稿”，新华网，2009年7月29日。

[4] Craig Whitlock, “China Rebuffed U.S. Request to Open Route for Afghanistan War Supplies, Cables Show”, *Washington Post*, July 02, 2011.

[5] “中美举行第七次反恐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9年9月16日。

[6] “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华网，2009年9月23日。

在2009年的夏秋之交，尽管中美两国关系非常热络，但是在具体的议题上，尤其是涉及战略互信的问题上仍然缺少进展。因此，美国国务院内对华友好派认为，有必要给予中国更明确的保证以建立战略互信，说服中国满足美国的需求。9月24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表了题为“中国到来：通往全球强国的长征”的重要演讲，提出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美国欢迎中国成为繁荣和成功的强国，而中国则要保证自身的崛起不会以牺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利为代价。显然，斯坦伯格代表的对华乐观派认为用承认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能够换来中国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遵守。

然而“战略再保证”的提法在中国获得的反响则较为复杂。怀疑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要求非常具体而对中国的保证则太空泛，中国有必要提出对美国“不安和关切的清单”，尤其是要让美国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停止干预。^[1]同时，中国国内很多声音认为“战略再保证”的提出和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倡议说明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战略困境，对中国有极大需求。^[2]即使是对“战略再保证”抱有正面看法的观点也认为，中美关系的进展建立在中国国家实力增强的基础上，美国的实用主义将促使美国欢迎中国发挥更大作用。^[3]事实上，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认为中美关系“攻守易势”的看法。这一颇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需要平衡“长期不平衡”的中美关系，而种种“中国责任论”则是对处于战略优势地位的中国的束缚和陷阱。^[4]在这种大环境中，“战略再保证”遭到冷遇实在是非常“自然”。

（三）“蜜月期”的终结

经过了长达九个月的“热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开始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美国朝野上下都期望这次访问能够在环境、经贸、反恐、朝鲜等问题上带来突破。在11月15—18日为期四天的访问中，奥巴马在北京会晤了胡锦涛主席，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最后还到上海与中国青年进行了对话。然而《中美联合公报》本身缺少新意、未有突破，中国也没有在访问中做出重大让步。^[5]

[1] 庞中英：“‘战略再保证’：美对华核心政策解密”，《中国报道》，2009年第11期，第63~65页。

[2]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1~8页。

[3] 金灿荣、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39~50页。

[4] 王缉思、崔立如、黄平、杨毅：“中美攻守易型，美国如今害怕被中国敲打”，《环球时报》，2009年12月30日。

[5] “胡锦涛、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中美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2009年11月17日。

奥巴马在15日的会谈后也承认，由于已经无法确保能够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因此不准备在2010年前达成正式条约。同时，中国媒体也没有对奥巴马在上海关于美国价值观的讲话进行现场报道，这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不满。在美国看来，这次访问完全符合《纽约时报》在11月15日做出的预测，即奥巴马在中国不仅不会享受到出访其他国家时的“奥巴马热”，而且中国还将不断地摆出“债主”的姿态。^[1]

在奥巴马回国后，提倡“战略再保证”的斯坦伯格和奥巴马本人都感受到了强大的国内压力。美国国内批评奥巴马的所有主要诉求都遭到了中国的拒绝，例如未能在伊核和朝核问题上施加压力，也未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取得中国的让步。为此，白宫发言人吉布斯（Robert Gibbs）不得不辩解表示两天半的访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理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们将继续努力取得进展。”^[2]

接下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成为终结奥巴马对华蜜月期的最后一根稻草。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在会议上，中美两国围绕“责任和能力的关系”问题针锋相对。美国试图打破《京都议定书》的约束，坚持要将自身的减排目标与中国挂钩。中国方面则坚定表示自身的减排目标不会和任何国家挂钩，强调自身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应当考虑减轻中国的责任并且给予适当的援助。美国国务院环境谈判特使斯特恩（Todd Stern）在9日表示，鉴于中国拥有充足的资金美国不会给予中国任何补助，并且不承认有任何义务来弥补历史上的排放。^[3]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则批驳斯特恩的言论“若非缺乏常识，就是极不负责任”。^[4]于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也是最大排放国的中美两国无法达成一致，哥本哈根会议也随之陷入僵局。

随着12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到达会场，会场上也出现了希望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在最后时刻发挥作用达成妥协的呼声。18日晚7

[1] Helene Cooper, Michael Wines and David Sanger, “China’s Roles as Lender Alter Dynamic for Obama’s Visi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9.

[2] Helene Cooper, “China Holds Firm on Major Issues in Obama’s Visi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2009.

[3] Fiona Harvey, “Climate Change Alliance Crumbles as Accord Is Labeled a Great Failure”,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3, 2009.

[4] “何亚非点名批评美国气候代表缺乏常识 美代表忙灭火”，凤凰网，2009年12月12日。

点，当温家宝总理正与南非、巴西、印度等三国首脑会面商讨“基础四国”立场时，奥巴马不请自来地进入会场，五国最终达成了协议草案并向大会提交。^[1]但是这一协议草案并非万众瞩目的法律协议，而仅仅是一纸保存颜面的政治宣言，其内容也极其让人失望。所以说，虽然中美两国政府都宣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但是却只是反映出中美两国在将近十个月的政策交流之后仍然无法达成一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eidman）对此评论道：“两大强国对对方非常警惕，决不做出能让对方获得战略和经济优势的交易。”^[2]

2009年底的奥巴马访华和哥本哈根大会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显示出对中美关系的明显消极影响：美方尽管没有获得其所需，但是基于各种原因仍然表示实现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合作本属不易；中方虽然担忧美国会诱使中国承担各种责任，但是对于“美国有求于中国”仍坚信不疑。但是，在表面的平静中天平的一端却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对华政策受挫的奥巴马政府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脆弱的对华倚重的政策也正在崩溃。《中国日报》关于哥本哈根大会的图片报道中奥巴马低头摊开双手、温家宝正坐俯视的照片使得美国国内对奥巴马“软弱”的攻击愈演愈烈。^[3]由此之后，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期待不再，而为了挽回自身的政治资本更需要新的政策。可以说，随着美国政策的急速转向，2009年的中美关系也成为了难以再次达到的高点。

2010年：“震荡”

2009年，中美在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没有取得美国预期的进展，又加上经历了奥巴马访华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外交失败，2010年初美国政府一改对华示好的政策，开始释放之前被压制的中美关系负面因素。除了对台军售、达赖、人民币汇率等传统问题之外，这一年的中美关系还持续受到谷歌事件、天安号事件、钓鱼岛撞船事件、延坪岛事件的冲击，双边在安全战略方面的互信受到严重损坏，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双方博弈也逐渐露出了苗头。

[1] “新华社曝温家宝哥本哈根会议斡旋内幕：反击西方指责”，新华网，2009年12月25日。

[2] “Obama Makes ‘Step Forward’ in Copenhagen”，CBS News, December 18, 2009.

[3] “Wen Meets Obama on Day of Whirlwind Diplomacy”，China Daily, December 19, 2009.

（一）遭遇密集挑战

2010年初，奥巴马调整对华政策的第一步行动就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1月16日，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获得了以爱国者3型导弹及其配件为内容的对台军售订单。^[1]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同时也宣称，对台军售的依据是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变。^[2]随后，奥巴马政府更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总价值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接连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立即引起了中国强烈的反应，除了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表示严肃抗议并要求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之外，外交部还宣布推迟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并且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进行制裁。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也召见了美国驻华武官，宣布暂停一切计划内的中美军方互访。^[3]中国一方面认为美方背弃了胡奥会上的承诺，一方面则认为美国仍然有求于中国，因此希望通过在美国所热心的军事和反恐交流上采取强硬措施来促使美国回到2009年的“固有”轨道上来。

同时，2月11日，中国外交部还敦促奥巴马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撤销会见达赖的计划。^[4]然而这些做法在美方看来却是中国“过于自信”的体现。^[5]结果，奥巴马和希拉里在2月18日同时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无视中国的抗议。而美国国内也开始认为，与中国政府增强关系的措施无助于美国解决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美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继续照顾中国的情绪已经没有意义。^[6]

就在台湾、西藏等“传统问题”复发的同时，中美关系在2010年初还意外地受到了谷歌事件的严重影响。1月13日谷歌官方博客宣布因为经常遭受不同程度的网络袭击以及中国政府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谷歌公司正在考虑完全退出中国市场。^[7]白宫发言人吉布斯当天则表示，谷歌在行动前已经与美国政

[1] “对台军售再拨台海政治心弦”，《中美关系简报》，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2011年9月1日~9月30日。

[2] “美重申对台承诺不变 台‘外交部’表欢迎”，环球网，2010年1月8日。

[3] “外交部、国防部分别召见美驻华大使和国防武官，国防部、全国人大及政协外事委员会、国台办分别发表谈话就美售台武器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人民网，2010年1月31日。

[4] “中方敦促美取消奥巴马会见达赖错误决定”，中国新闻网，2012年2月12日。

[5] Geoff Dyer and Edward Luce, “China Warns US Over Dalai Lama”, *Th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 2010.

[6] John Pomfret, “Obama Meeting with Dalai Lama Complicates U.S. Ties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9, 2010.

[7] David Drummond,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official googleblog, January 13, 2010.

府进行了充分的协调，白宫支持网络自由的原则。^[1]希拉里还于1月21日再次要求中国对于谷歌及其他公司遭遇的网络袭击给予“彻底、透明”的调查，并且宣称“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应当面对后果和国际谴责”。^[2]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指责中国政府和黑客攻击行为有关联，这种说法纯属无中生有，也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3]最终，谷歌公司在3月23日彻底退出了中国市场。这一事件不仅使得美国凝聚起了在这一议题上的共识，而且也促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回到了“激进民主派”的立场上，明显改变了对华腔调。

可以说，美国政府在2009年对中国抱有 unrealistic 的过高期待，而在遭遇挫折之后又缺少耐心，过快地调整了对华策略。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发展“内在节拍”的做法反过来也使得中方认为美方“背信弃义”^[4]，使得疑虑和警惕进一步加深。

在经济问题上，美国虽然表现稍显理智，但是同样加大了施压力度。2月3日，奥巴马在会见美国参议员时表示，他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以避免美国由于其他国家“人为压低汇率”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5]3月16日，在布什政府期间扮演汇率问题急先锋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E. Schumer）与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更是向国会提交了《2010年货币汇率监管改革法案》，这一法案为财政部宣布一国是否属于汇率操纵国列出了“客观标准”，试图减少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并且给予汇率操纵国更严厉的惩罚。^[6]虽然这种做法过于激进，但是奥巴马也乐于利用这一国内形势，以“不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作筹码来换取中国的让步。

不过，在3月27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率团访美后，美方也似乎开始接受“强压人民币升值往往适得其反”的观点。^[7]4月2日胡锦涛还受邀与奥巴马通电话，并在经贸问题上实现了口头上的“互相理解”；同时，胡锦涛关于“奥巴马

[1] Peter Foster, Malcolm Moore and Toby Hamden, “Obama Backs Google in Dispute with China”, *The Telegraph*, January 13, 2013.

[2] “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 Remarks by Secretary Clinton, February 21, 2010.

[3] “秦刚：‘指责中国幕后支持黑客行为’一说别有用心”，中国新闻网，2010年2月23日。

[4] 袁鹏、王鸿刚：“振荡，调整，再平衡：2010年的中美关系”，载于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第252页。

[5] Matthew Weaver, “China Hits Back at Obama’s Claims that Yuan Is Undervalued”, *The Guardian*, February 12, 2010.

[6] “Bipartisan Group of Senators Unveils New Legislation to Crack Down on Unfair Currency Manipulation by Countries Like China”, Senator Chaels E. Schumer Senate Website, March 16, 2010.

[7] 温宪：“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对话美国媒体”，人民网，2010年3月27日。

总统就职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的说法，也颇有年初的冲突已经“翻篇”之感。^[1]次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就正式宣布将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发布的《主要贸易对象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他表示未来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内的高端平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更好方式，还称赞了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2]

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选择了既不立即与中国摊牌以示合作，又不直接否认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做法，意在保留这一政策杠杆。对于这种“留后手”的做法，中国也仍表满意。《人民日报》英文版直接称赞盖特纳的做法将“产生积极影响”，甚至还引用了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所写的“谢谢盖特纳”作为结尾。^[3]这也为奥巴马和胡锦涛在4月12—15日的核峰会会晤创造了良好条件，美国社会也普遍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回暖的标志。美国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贝德（Jeff Bader）甚至在会议期间透露，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已经准备与美国“合作”。^[4]

然而，就在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峰回路转之际，3月底发生的天安号事件却开始引起严重的后续反应。在沉船一个半月之后的5月20日，韩国正式指责天安号是遭到朝鲜鱼雷击沉。朝鲜立即作出态度强硬的反应，指责韩国的表态是“严重挑衅”。^[5]由于朝鲜和韩国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国表态审慎。国防部长梁光烈表示：“即使最终结果已经做出，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仍然应当用谨慎的方式冷静对待。”^[6]但是美国却很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加强与韩国的关系，并且趁机说服中国与美国保持相同的对朝强硬立场。因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又增加了新的目标，她既希望中国能够在安理会投票赞成制裁伊朗，又希望中国能够在联合国支持通过就天安号事件谴责朝鲜的决议。考虑到中国的立场，美国国务院也承认，完成“临时加码”后的双重任务“并不轻松”。^[7]果不其然，在5月24—25日举行的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更

[1] “国家主席胡锦涛2日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新华社，2010年4月2日。

[2]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宣布：推迟公布汇率政策报告”，新华网，2010年4月4日。

[3] “Geithner’s Report Delay will Pay Dividends”，People’s Daily online, April 7, 2010.

[4] Howard La Franchi, “US-China Relations Warm as Obama and Hu Jintao Mee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12, 2010.

[5] “韩国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 确认系遭朝鲜击沉”，新华网，2010年5月20日。

[6]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Urges Caution Over Cheonan Sinking”，*The Chosunilbo*, May 14, 2010.

[7] Howard La Franchi, “Hillary Clinton in China: a Juggling Act over North Korea, Ira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4, 2010.

加明显地出现了经济热门、战略“消失”的现象，美方自然也没能在对话中争取到中方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的支持。

（二）天安号事件失控与军事关系恶化

6月2日，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防务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突然得知，中方以“时机不方便”为由拒绝了其接下来访问中国的要求，美国认为此举是中国对美国的突然“非难”。^[1]盖茨本人对此也非常生气，他在6月5日的香格里拉会议上表达了对中美两国“没能建立持续而可信赖的防务关系”不满，指责中国中断正式军事交流的做法。这引起了同样到会的中国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的强烈回应，他表示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国会对双边军事交流的限制以及美国的侦查行动才是阻碍中美关系的原因。^[2]

同时，美国军方确信天安号事件是朝鲜所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Mike Mullen）表示美国将和韩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演练针对来自小型潜艇的威胁，并且计划派遣第七舰队的航母战斗群来执行演练和监控任务。^[3]与筹划军演同步，6月2日韩国也开始在安理会推动决议，由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5月28日访问首尔时表示过“中国不会庇护任何人”，因此韩方也认为在争取得到美国的支持后，中国也是可以争取的。^[4]而奥巴马政府也在帮助韩国向中方施压，甚至指责中国对“持续存在的问题有意视而不见”。同时在盖茨访华受阻一事上，奥巴马也直接表示无意在中国提出的“不可接受的条件”下开启高层军事交流，暗指不会在对台军售等问题上改变立场。^[5]

对此，中国方面则表示在天安号事件上“中方的立场和努力无可指责”，并且暗讽美国“火上浇油”、“趁火打劫”，强调中国比“远在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国家”有“更直接、更严重的关切”。^[6]最终，在一番博弈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没有具体指向朝鲜、谴责天安号事件的决议。虽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声称这一决议是对朝鲜发出的明确信号，但是朝鲜

[1] “媒体称中国拒绝美国防长盖茨下周访华”，人民网，2010年6月3日。

[2] Richard Weitz, “China Overplays Taiwan Arms”, *The Diplomat*, June 21, 2010.

[3] Wang Jyh-perng, “Taiwan to Learn from Cheonan Incident”, *Taipei Times*, June 9, 2010.

[4] Scott Snyder and See-Won Byun, “Cheonan and Yeonpyeong: the Northeast Asian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Provocations”, *RUSI Journal*, April/May 2011 Vol. 156 No. 2 pp. 74 – 81.

[5] Douglas H. Paal, “Obama on Asia Offensive at the G20 in Toronto”, *Carnegie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 June 30, 2010.

[6] “外交部：中方对‘天安号’事件立场无可指责”，中国新闻网，2010年6月29日。

驻联合国大使申善昊同样宣布这一决议是“外交胜利”。^[1]从结果看，安理会决议显然更接近于中国的立场，而韩国和美国自然无法对这一结果表示满意。

在安理会受阻后，美国和韩国更迫切地希望用展示武力的方式来震慑朝鲜，韩国政府和媒体自6月初就开始热炒美国航母即将前来黄海参加联合军事演习的消息。^[2]这一消息在中国社会出人意料地激起了轩然大波，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媒体，将美国军舰在黄海的出现当作“霸权主义军事挑衅”。7月1日，中国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在接受香港地区媒体采访时率先表示，由于黄海距离中国很近，中国对于此次军演“非常反对”。^[3]7月8日，外交部也正式表示“坚决反对外国军用舰机到黄海及其他中国近海从事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活动”，^[4]这也标志着中国确认了反对美韩黄海军演的外交政策。

原本，美国和韩国推迟军演的部分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的决议，在争取中方无望后，美方决定不再拖延下去，防止“美国信誉”因为犹豫不决而受损。7月14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莫莱尔（Geoff Morrel）强硬表示，美国考虑到了中国的意见，但仍然决定进行演习，并声明在国际公海上“只有美国海军、国防部和美国政府能够决定何时、何地、与谁、如何进行演习”。美国还在没有确定参演部队的情况下就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一定会名列其中。^[5]

不过，演习的地点最终被定在了朝鲜东海岸的日本海域，这一选择也是试图将矛盾的焦点重新放在朝鲜身上，避免对中国的刺激。^[6]尽管如此，中国方面还是在7月25日、26日、27日连续进行了三次军事演习作为对25日美韩军演的回应。^[7]可以说，源于第三方、原本与中国和美国并无直接关系的天安号事件由于双方的政策立场差异而最终失控，莫名其妙地转变为影响两国关系、损害战略互信的冲突，最终形成了中美两国同时“展示肌肉”的局面。

（三）美国改变南海政策

随着中美关系的转冷，美国也开始抛弃顾虑，更多地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1] “UN Security Council Condemns ‘Cheonan’ Sinking”, *Voice of America*, July 8, 2010.

[2] 孙哲主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美关系变革》，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第259页。

[3] “解放军副总长：非常反对美韩在黄海举行军演”，凤凰网，2010年7月1日。

[4] “2010年7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0年7月8日。

[5] “US, South Korean Navies Will Exercise in Yellow Sea Despite Chinese Objections”, *Voice of America*, July 14, 2010.

[6] “美韩军演进入倒计时，中美博弈仍斗而不破”，新华社，2010年7月20日。

[7] 孙哲主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美关系变革》，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第262页。

矛盾来提升美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原本在7月22日，希拉里在访问越南时还仅表示打算在23日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提出和缅甸、朝鲜相关的问题，^[1]但是在会议的闭幕会上，她却发表了令中国感到意外的讲话，尽管其中仍然重申了美国在领土问题中“不选边”，但是“反对威胁或者使用武力”、提倡用“无强迫的合作外交程序解决领土争端”显然都是针对中国。^[2]美国的“不介入”政策在这一讲话之后可谓寿终正寝。

该表态在会上获得了东盟12个国家的响应，而这也是15年来中国第一次没能阻止在东盟的高层论坛上讨论南海领土争端问题。^[3]同时，各国媒体还纷纷透露斯坦伯格和贝德在3月份访问北京会见戴秉国、杨洁篪时，中方表示过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希拉里也声称在5月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中方也做出过这种“核心利益宣示”。^[4]然而，从结果来看这些表态不仅没有产生阻止美国的效果，反而坚定了美国干预南海问题的决心，并利用其来为政策转向造势。到会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准备好的讲话稿中原本是要提出“互联互通”、深化自由贸易区等多项合作的内容，在希拉里讲话后，杨洁篪放弃了原定的讲稿，转而驳斥美国“貌似公允的讲话实际上是在攻击中国，是在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南海局势十分堪忧的迷相”，并且强调了中国和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并不是中国和东盟间的矛盾，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自由通航没有任何问题。^[5]

除了唇枪舌剑以外，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和约翰·S·麦凯恩号驱逐舰在8月先后抵达越南岷港，越南外交部表示美国军舰进入越南港口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有利于“地区平衡”，并且鼓励美国继续在南海区域发挥“更大的作用”。^[6]同时，美国太平洋司令威拉德（Robert Willard）在会见菲律宾军方时除了重申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之外，进一步表示美国支持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扩充军事力量，声称这有利于“防止冲突、维持和平”。^[7]中国国防

[1] Karen DeYoung, "In Hanoi, Clinton Highlights Closer Ties with Vietnam, Pushes for Human Right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2010.

[2] Hilary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marks by Secretary Clinton, July 23, 2010.

[3] Emma Graham-Harrison, "Analysis: South China Sea Spat Fresh Threat to Sino-US Ties", *Reuters*, July 27, 2010.

[4]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Can China Defend a 'Core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pring/2011.

[5] “希拉里就南海问题发难，杨洁篪外长驳斥歪论”，中国新闻网，2010年7月26日。

[6] 李金明：“南海问题：美国从中立到高调介入”，《世界知识》，2010年第24期，第34-35页。

[7] “美高官公开鼓动东南亚国家扩军以‘防止冲突’”，人民网，2010年8月19日。

部也相应于7月30日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反对“国际化”的同时也愿意遵循国际法和友好地解决、尊重其他国家“符合国际法要求的航行和飞行方面的自由”。^[1]要而言之，由于美国的政策改变迎合了东南亚国家的心理，在表面上也显得“较为适度”，因此中国方面除了一般性的表态反对之外，首先还是考虑冷静处理这一问题。

因此，8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赴华盛顿与斯坦伯格进行了直接沟通，并且会见了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Thomas Donilon）和国防部副部长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双方宣示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双方都要“适当地处理争议和敏感问题”。^[2]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有声音表示将“南海问题”升级为核心利益的提法“极不明智”，认为其不是中国政府的正式政策。^[3]这也被视为北京要调整对美政策的信号。

美方也很快做出了回应，派出了以经济顾问萨默斯（Larry Summers）、多尼隆、贝德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哈默（Michael Hammer）组成的高级访华代表团。该代表团不仅会见了戴秉国和王岐山，还受到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超规格”接见。^[4]其中，萨默斯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中国继续持有美国资产，并且劝说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的节奏；而多尼隆则是要与中国协商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安全政策。在接见中，胡锦涛没有提及中美之间一度非常激烈的种种争论，而是表示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发展良好，双方应当加强交流和互信。^[5]作为对于盖茨来访遭拒的“补偿”，多尼隆还会见了中国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这也从形式上象征着中美之间的军事安全交流重新开启。^[6]

（四）钓鱼岛撞船事件与延坪岛炮击

2010年秋季中美关系再度显示出进入“正轨”的迹象。针对汇率问题，盖特纳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问题，美国应加强自身经济的建设。^[7]9月2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率领

[1] “国防部：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中国新闻网，2010年7月30日。

[2]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ld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at Vice Foreign Ministerial Level”,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India, Reports from China, August 27, 2010.

[3] “专家称‘中国将南海升级为核利益’提法极不明智”，人民网，2010年8月24日。

[4] “Summers, Donilon Get Unusual China Access as Yuan Debate Looms”, *Bloomberg News*, September 8, 2010.

[5] “胡锦涛会见多尼隆和萨默斯：中美应坚持对话交流”，中国新闻网，2010年9月8日。

[6] “徐才厚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解放军报》，2010年9月9日。

[7] “美财长：人民币升值不会抹掉美国全球贸易赤字”，中国新闻社，2010年9月17日。

由外交部、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和卫生部等五个部门领导组成的“重量级”团队到达纽约，出席联合国的一系列多边活动。^[1]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温家宝和奥巴马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谈，两国首脑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超出以往”的深入讨论，会晤气氛较为友好。

就在双边关系走向缓和之际，9月7日，中国渔船与日本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了冲撞事件，日方依照国内法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扣押了中国船长和14名船员。针对这一事件，中国方面在敦促日本政府“回到正轨”的同时，依然表示中日关系之前处于“良好势头”。^[2]而美国方面起初对于钓鱼岛争端并不是很重视，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Philip Crowley）仅表示“希望中日两国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并且相信“两个成熟国家具备解决问题的充分能力”，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3]最终，事件的结局是被扣的中国船长被冲绳的那霸监察厅以“无意撞船，又没有造成严重损失”为由予以释放。^[4]这一事件也所幸没有对中日、中美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同时，中美军方也展现出了修补关系的姿态。首先是9月底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迈龙（Michael Schiffer）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防部外事办主任钱利华，基本上实现了“修补和启动”中美军事对话的目标。^[5]然后在10月12日的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会见了四个月前访问遭拒的盖茨并邀请后者访华。^[6]而在经济方面，盖特纳又在10月15日宣布继续推迟公布《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这也让美国国内希望正式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势力大失所望，相反盖特纳还表示“认可中国从9月份以来采取的加速人民币升值的做法”。^[7]

总体来说，到10月中旬为止，中美两国似乎已经在人民币汇率、中美军事交流等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也没有扩大，双边关系俨然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因此11月11日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二十国集团峰

[1] “温家宝启程前往纽约 再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中国新闻网，2010年9月21日。

[2] “温家宝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船长”，新华社，2010年9月22日。

[3] “Clinton: Senkaku Subject to Security Pact”，*The Japanese Times*, September 25, 2010.

[4] “中日紧张不断升级 日方宣布将释放中国船长”，凤凰网，2010年9月24日。

[5] Larry Shaughnessy, “Official: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Back on Track’”, *CNN U.S.*, September 29, 2010.

[6] “梁光烈分别会见美韩防长 与日本防卫大臣简短交谈”，人民网，2010年10月12日。

[7] Agustino Fontevvecchia, “Geithner Delays Chastising China On Currency”, *Forbes News*, October 15, 2010.

会上的会晤也较为轻松，胡锦涛向奥巴马表达了中国实行汇率改革的决心，同时呼吁美国要照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并给予支持。^[1]而奥巴马则面临着说服多国领导人承诺保持贸易平衡的任务，因此除了在口头表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负有“特殊责任”之外，也没有向中国进行过多的单独施压。^[2]

然而，这一平稳局面又被朝鲜半岛上的突发事件所打破。11月23日下午两点，朝鲜方面突然对正在进行护国军演的韩国西部海域的延坪岛进行炮击，韩国方面也立即进行了还击并宣布进入非战争状态下的最高警戒级别。^[3]美国对此立即反应，奥巴马在当晚就致电韩国总统李明博将与其“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并且表示将立即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进入黄海海域与韩国进行联合演习，并且表示中国应该“让朝鲜清楚地认识到有一些必须遵守的国际规则”。就在美航母进驻黄海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罗利还表示“中国对朝鲜确实拥有影响力，我们希望和期待中国能运用这一影响”。^[4]

中国方面则在24日通过外交部首先做出了传统的“呼吁双方保持冷静”的表态，声明对其造成的损失表示“痛心和遗憾”。^[5]10月6日，胡锦涛在电话中向美国方面提出了“要缓和、不要紧张，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呼吁，表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才是当务之急。^[6]但是，由于天安号事件相去未远，美韩两国在采取强硬行动时也显得更有底气。相对的，中国也就更难以维持原有的反对军演的立场。11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先后通电朝、美、韩三国，提议立即紧急启动六方会谈，解决延坪岛事件和整体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7]但是美国显然不准备依赖中国来解决问题：12月6日，美、日、韩三国在华盛顿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表达了对朝鲜炮击和铀浓缩活动的强烈谴责，宣示美韩、美日军事同盟和日韩协作是东北亚稳定与和平的基础。^[8]

[1] “胡锦涛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新华社，2010年11月11日。

[2] “Barack Obama Asia Trip: President Says US and China ‘Making Progress’”, *The Telegraph*, November 11, 2010.

[3] “韩国为延坪岛炮击事件中丧生士兵举行葬礼”，新华网，2010年11月27日；“韩国政府计划投入300亿韩元帮助延坪岛重建”，《中国日报》，2010年12月6日。

[4] Tania Branigan, Ewen MacAskill and Steven Borowiec, “US to Press China to Rrein in North Korea After Attack”, *The Guardian*, November24, 2010.

[5]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朝韩交火事件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0年11月24日。

[6] “胡锦涛应约同奥巴马就朝鲜半岛局势通电话”，中国新闻网，2010年12月6日。

[7] “杨洁篪与希拉里通电话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新华网，2010年11月27日。

[8] “Trilateral Statement Japan,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ress Releases, December 6, 2010.

事后看来，正是由于天安号事件的前科，延坪岛炮击事件才会在爆发后产生出与半年前完全不同的态势。韩国基本放弃了通过安理会谴责朝鲜的想法，而是用加强美日韩军事同盟来做出回应。^[1]美国则趁机实现了巩固与日韩军事同盟、成功派遣航母进入黄海展示决心，而中国则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更多压力以及对于周边环境的更大疑虑。

2011年：“低走”

2011年，中美关系尽管有胡锦涛访美的良好开局，但在安全交流与人权问题上屡屡遭遇困难。两国对阿拉伯之春的不同判断，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负面因素。尤其是这一年年初，美国的东亚政策出现了整体大换班的局面，对华温和的团队被主张强硬的团队取代。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美国推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塑造了中美关系的新的冲突领域。

（一）胡锦涛访美成行

2011年1月中国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获得成功，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因此1月3日外交部长杨洁篪先期赴美进行外交准备，希望能够在中美贸易、伊朗、朝鲜以及苏丹公投问题上定调。^[2]与此同时，美防长盖茨在1月9日到达北京，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这既是中方展现军事透明的举措，也是对盖茨本人的安抚。^[3]然而就在盖茨访问的当天，中国通过网络透露了新型歼-20战斗机的试飞，以致其直接询问胡锦涛，此举是否与此次来访相关。^[4]这一事件也使得整个访问都被蒙上了阴影。

为了配合胡锦涛访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7日还在纽约时代广场首先播出了包括姚明在内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人物篇”，为访问预热。^[5]两天后，胡锦涛抵达圣安德鲁斯空军机场并在演说中热情地表示“中美两国远隔万

[1] 沈丁立：“东北亚安全体制：2010年的动荡催化新制度建设”，《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 “奥巴马突然现身与杨洁篪会谈 提前为胡奥会定调”，新华网，2010年1月6日。

[3] “美防长抵中国访问 我军少将称有利降低两军误解”，中新社，2011年1月10日。

[4] Peter Ford, “Gates’s China Visit: Beijing Confirms Stealth Fighter Test Flight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1, 2011.

[5] “Debut of China Publicity Film to Coincide with Hu’s US Visit”, *People’s Daily Online*, January 13, 2010.

里，但浩瀚的太平洋没有阻隔两国人民友谊”。^[1]胡锦涛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参众两院领袖、前总统克林顿，并且在华盛顿和芝加哥进行了密集的交流互动。同时，中美之间还签订了总额高达450亿美元的经贸合同。^[2]然而，胡锦涛在美国的访问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与奥巴马会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第一个提问的美联社记者就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且表示“胡主席，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来回应人权问题”。在没有得到回应后，第二名美国记者再次提出。胡锦涛当即表示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由于翻译问题，并表示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并且愿意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交流。^[3]

尽管中美双方政府都表达了增进双方关系的意愿，但是在会后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出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说法与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提出的“积极、全面、合作”相比更多地强调了双方的差异和矛盾。^[4]而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一峰会也说明了中美两国还是只能解决双边而不是世界性的问题，“中美共治”的期望已被彻底终结。^[5]

会后，尽管没有像奥巴马访华之后那样立即发生对台军售、会见达赖这样的“恶性事件”，但是美国却开始在一些新议题上向中国提出挑战。2月10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迈卡菲（McAfee）发表报告表示中国黑客正在对西方五大能源公司进行有组织的网络间谍活动，并且窃取了大量的商业机密。^[6]2月15日，希拉里对中国进行了更全面的指责，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关于“网络自由”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国、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埃及限制网络自由。^[7]考虑到突尼斯、埃及从2010年11月底起就相继陷入阿拉伯之春的骚乱之中，其中推特（twitter）等网络平台成为反对派进行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工具，中方对于希拉里提倡的“连接的自由”（Freedom of Connect）却只能是更加警惕。因此在2月17日，中方针对希拉里的谈话表示中国充分保障了公民网上的言论自由，对互联网

[1] “胡锦涛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人民网，2011年1月19日。

[2] “美称中美签署450亿美元订单 中方购200架飞机”，人民网，2011年1月20日。

[3] “胡锦涛坦率回应人权问题获外媒赞誉”，凤凰网，2011年1月21日。

[4] 孙哲主编：《亚太战略变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事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第26页。

[5] Amitav Acharya, “Hu Visit Ends Any Dream of a US-China Duopoly”, *East Asia Forum*, January 25, 2011.

[6] “FBI调查中国黑客攻击西方油气集团”，《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2月11日。

[7] “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 Choices and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by Secretary Clinton, February 15, 2011.

的依法管理符合国际规范，并且反对任何国家以网络自由为名干涉中国内政。^[1]这一表态也成为中方在这一议题上的基本立场。同时这次交锋也说明，一个月之前的隆重访问在改善两国关系上并未发挥明显作用。

同时，除了网络自由议题之外，2010年底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也让中美双方在利比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3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投票中，中方虽然表示反对对利比亚政权使用武力，并且对决议中的部分内容持有“严重保留”，但是为了照顾阿盟和非盟的关切而没有予以反对，仅仅投了弃权票。^[2]这使得授权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且采取“一切有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平民”的决议得以通过，^[3]并在事实上为英、法、美等国“合法”进行武力干涉亮起了绿灯。在西方各国武力干预利比亚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对空袭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表示“遗憾”，并反复表示反对使用武力。^[4]而奥巴马政府则采取了被称为“幕后领导”（Lead in Behind）甚至“奥巴马主义”的策略，不再处于干预的第一线。一方面美国对于干预利比亚并不热心，另一方面中国的反对也并不坚决，围绕阿拉伯之春中美两国暂时形成了一种“冷淡的平衡”。

（二）安全交流与人权攻势

2011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政策团队也发生了重大的人员调整。首先是国务院的二号人物斯坦伯格宣布辞职，这位提出“战略再保证”、对华奉行温和路线的学者型官员尽管拥有奥巴马的支持，但是其政策观点在国务院和美国政府内部却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3月30日斯坦伯格公开表示其在国务院内“不开心”并表示要重返学术界，其职务将由老资格的外交官伯恩斯坦（William Burns）接任。^[5]随后，其政策盟友、美国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贝德也在4月中旬辞职。这两项涉及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大人事调整被视为美国政策将由“增进与中国的关系”转向“制衡中国”的标志。^[6]随着他们的离开，国务院东亚政策逐渐落

[1] “2011年2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1年2月17日。

[2]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安理会通过关于利比亚问题的第1973号决议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1年3月18日。

[3] “U.N. Security Council Authorizes No-Fly Zone in Libya”，*Fox News*, March 17, 2011.

[4]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1年3月20日。

[5] Jennifer Epstein, “Hillary Clinton’s No. 2 at State Steps Down”，*Politico*, April 3, 2011.

[6] William Lowther, “Obama’s Top China Hand Jeffrey Bader Leaves Job”，*Taipei Times*, April 14, 2011.

到了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手中，而在国安会贝德的副手拉塞尔（Daniel Russel）则接替了前者的职务。而在此之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也因为要加入2012年总统大选而宣布辞职，他的职务则由华裔商务部长骆家辉接任。

在完成这一调整之后，希拉里也得以在对华政策上更充分地施加其影响力。在中美第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会场上，虽然希拉里和盖特纳一个表示应当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建立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一个宣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但是在开幕式上，即使是被认为温和派的副总统拜登也表示讨论人权问题并非对中国的干涉。希拉里则以阿拉伯之春为例暗示不改进人权状况就难以取得稳定，她露骨地表示：“这一点肯定已经被时间反复地证明，尤其是最近几个月。”^[2]在双方日渐话不投机之际，此次对话的最大亮点就是中国终于同意派出军方代表讨论敏感的安全问题。^[3]

与此相呼应，在6月3日的香格里拉防长会议上，国防部长盖茨也明确表示“与20年前相比，整个亚洲有非常强烈地与美国加强军事联系的愿望”，^[4]而首次参会的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则面临着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言行不一”的指控。这种争论给了盖茨更多的“居中调停”的空间，他暗示中国的军事行为确实引起了忧虑，尽管这还没有达到违背“和平发展”承诺的程度。^[5]就在香格里拉防长会议结束不久后，南海地区局势的发展又似乎印证了盖茨的说法。先是越南于6月9日武力驱逐了在南海地区作业的中国渔船，然后又于13日在西沙群岛以西250公里处的海域进行“例行”实弹军事演习。^[6]紧接着，菲律宾又开始抗议中方在黄岩岛修建军事设施，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甚至在6月17日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7]面对菲律宾和越南对美国承诺的“需求”，美国一方面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一方面派遣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在内的军舰多次进入南海，并

[1]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四个亮点”，人民网，2011年5月11日。

[2] James Rosen, “U.S.- China: The Unspoken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Fox News Politics*, May 9, 2011.

[3] “Interview With Hu Shuli and Huang Shan of Caixin Media Company”, Remarks by Secretary Clinton, May 11, 2011.

[4] Robert Burns, “Gates Pledges Wider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UT San Diego*, June 3, 2011.

[5] Demetri Sevastopulo and Kathrin Hille, “China Defends Naval Actions”,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5, 2011.

[6] “越南6月13日在其中部外海举行实弹演习”，凤凰网，2011年6月14日。

[7] “菲律宾总统警告中国 称不会在南海退让”，凤凰网，2011年6月20日。

且多次确认美对菲的防卫承诺。^[1]

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中国和美国于6月25日进行了第一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US-China Asia-Pacific Consultations）。会前中方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表示，如果美方确实想参与南海事务，那么其应当让频繁进行挑衅活动的国家保持克制。^[2]尽管会议的细节并未公布，但是中美双方的整体态度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美方因为怀疑中国会更加彻底地主张对全部南海岛屿的主权，因此更迫切地要求中方提高军事透明度和保持克制。而中方则认为其他国家主动挑起冲突，中国只是被迫进行反应。^[3]

除了南海问题之外，美国仍然在推行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全面施压的政策。即将上任的骆家辉的涉华言论持续强硬，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直白地宣示其要以阿拉伯之春为榜样，直接同中国民众接触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4]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在6月初访问非洲五国时提出了“新殖民主义”的说法，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5]而更为严重的是，奥巴马再次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尽管这一会见方式相对较为低调，但这仍然说明奥巴马对中美发展合作关系的期望已经下降，从而更多地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达赖问题。^[6]这自然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谴责其“伤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7]

8月12、17日，驻华大使骆家辉和副总统拜登先后来到北京，前者是正式赴华履行职务，后者则是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拜登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内所剩不多的对华温和派，中国方面也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美关系。胡锦涛主席在北京会见拜登时也特别提出，中美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超越国情差异”，拜登则仅表示理解中国在核心利益上的关切。^[8]但是在此次访问中拜登也有意识地展开了对中国民众的直接攻势，8月18日中午他与骆家辉一起在北京的小吃店吃炸酱

[1] Kate McGeown, “US ‘Stands by Philippines’ Amid South China Sea Tension”, *BBC News*, June 24, 2011.

[2] Anna Fifield, “China Warns US over South China Sea”,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22, 2011.

[3] “U.S., China Broach South China Sea in Hawaii Talks”, *Reuters*, June 26, 2011.

[4] “Opening Remarks by Secretary Locke at Confirmation Hearing”,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6, 2011.

[5] “Clinton Warns Against ‘New Colonialism’ in Africa”, *Reuters*, June 11, 2011.

[6] “Barack Obama Meets the Dalai Lama at the White House”, *The Guardians*, July 16, 2011.

[7] “中方就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新华网，2011年7月17日。

[8] “胡锦涛会见美国副总统拜登”，《人民日报》，2011年8月20日。

面，吸引了中国媒体的不少眼球，^[1]这也呼应了新任驻华大使在14日身背双肩包抵达北京的形象，而后者在9月下旬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更是用搭乘经济舱的方式引来大量关注。^[2]可以说，美国大使成功地将自身打造成了中国舆论关心的焦点，而美国国内也赞赏骆家辉很好地展现了“谦卑的软实力”。^[3]

美国国务院之所以加大对华的“人权攻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鼓舞，到8月底时，尽管奥巴马更愿意将利比亚政权更迭视为“幕后领导”结出的果实，但是美国国内已经普遍将利比亚视为“人道主义干预”、“保护原则”的胜利。^[4]然而在中国看来，西方在利比亚的做法违背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是意在颠覆他国政府的险恶之举，需要对这类手法高度警惕。

（三）美国构建“太平洋世纪”

11月10—14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召开。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以“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为题为美国的亚太政策定调。在文章和讲话中，希拉里指出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都将是决定性的，美国绝对不会从东亚撤出，并且还要“升级”其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希拉里宣示将像打造跨大西洋联盟一样经营亚太地区的多边体系和军事同盟，以更好地应对崛起国家。而其具体建议也充满了与中国对抗的意味：增强美日、美菲同盟让中国怀疑美国在领土争端中的立场，扩大贸易和投资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则将中国排除在外，而增强地区多边机制又可能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政策，推进自由民主更是加深了中国对美国“和平演变”的疑虑。^[5]

奥巴马虽然没有在APEC峰会上高呼“重返”（Pivot）亚洲，而是将议题限定在经贸领域，但是其对华态度也算不上友好。在开幕致辞上奥巴马指责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行事”。12日奥巴马与胡锦涛的会谈中更是非常直接地表示他已经对中国经济政策和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失去耐心”并且“感到沮丧”。从某种程度上说，2011年底起奥巴马政府已经将重点清晰地

[1] “拜登访华忙里偷闲 在小店品尝北京炸酱面”，《环球时报》，2011年8月18日。

[2] “骆家辉走马上任一月三把火 坐经济舱引热议”，人民网，2011年9月20日。

[3] Paul R. Pillar, “The Soft Power of Humility”,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18, 2011.

[4] David Cortright, “A Major Win for Obama's Libya Policy”, *CNN*, August 23, 2011.

[5]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Remarks by Secretary Clinton: November 201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11.

由“欢迎一个繁荣的中国”转移到了要求中国遵守美国所制定的规则上来。

尽管中国国内对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说法存有疑虑，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其表示反对，而美国却决心进一步为新的亚太政策造势。11月16日，参加完APEC会议的希拉里就造访马尼拉庆祝美菲同盟建立60周年，并向菲律宾转交了第二艘海岸巡逻舰以促进菲海军的现代化。^[1]希拉里还公开表示在领土争端中支持菲律宾，再次提出应当在即将召开的东盟峰会中讨论南海领土争端，而这是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的。^[2]奥巴马在会后则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表示美国军事力量将“待在这里”，并且表示削减军费不会以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开支作为代价。在发言中，奥巴马还明确表示中国应当遵守“国际准则”，所谓“美国害怕中国”的说法纯属误解。^[3]而在言辞之外，奥巴马还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永久驻军条约，并将部署2500人的海军陆战队。

11月17日奥巴马成为了第一位出席东盟峰会的美国总统，而他试图用南海问题来证明是美国而非中国才是对东南亚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尽管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抵达巴厘岛后获得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在不讨论南海问题上的支持^[4]，但是在闭门会议中美国仍然成功地促使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提出讨论南海问题，并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在美国舆论看来奥巴马在这一轮获得了成功。^[5]与此同时，在东盟峰会希拉里还对缅甸进行了“里程碑式的”访问，她不仅会见了昂山素季、提出重新设立大使馆，而且还鼓励缅甸进一步改革，这也被视为美国在中国周边和人权外交中的重大突破。^[6]

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于12月18日在“2011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表示“太平洋足够宽广，应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存与合作”，以此作为对美国“太平洋世纪”的回应。他一方面表示“重返”并无太多意义、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并未因此而出现恶化，另一方面

[1] Robert Warshaw, “U.S. Reaffirms Commitment to the Philippines: Another Ship on the Wa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vember 18, 2011.

[2] Paul Eckert and Manuel Mogato, “Clinton Warns Against Intimid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The Reuters*, November 16, 2011.

[3] “Barack Obama in Australia: Asia-Pacific Region Is Key to the Future”, *The Telegraph*, November 17, 2011.

[4] “温家宝：东盟会议不应谈南海问题”，凤凰网，2011年11月18日。

[5] Peter Symonds, “Obama Forces Discussion at Bali Summit on South China Sea”,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November 21, 2011.

[6] Andrew Quinn, “Clinton Offers Myanmar First Rewards for Reform”, *The Reuters*, December 1, 2011.

则表示中国“无意也无力”排挤美国，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建设性作用。^[1]然而，与这一“坦然”态度相伴的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步伐的加快，中国也渐渐发现周边环境越发棘手。

2012年：“新型大国关系”

进入2012年后，美国不仅扭转了金融危机以来的下降态势，成功实现了战略收缩，而且借助阿拉伯之春在中东扳回了“民主价值观”上的一局，甚至在东亚也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伙伴来“对冲”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面对这一局面，中国有学者过多地看到了美国有求于我的成分，同时对于“战略再保证”、在阿富汗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存在着过多防范的心理。^[2]201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共和党的罗姆尼，在经济和“重返亚洲”政策上都对中国表现出强硬的立场。^[3]可以说，对待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战略误判，因此从2012年开始，中方更多地尝试主动建立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以争取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化解对中国的防范。

（一）“前无古人的新型合作关系”

2012年2月1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展开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在拜登和希拉里为其准备的欢迎午宴上，习近平提出了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说法。这一“新”就新在要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4]这也成为了日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雏形。此次出访的最大收获就是习近平充分展示了作为中国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亲民和坦诚的特点，非常符合美国社会的胃口。习近平不仅在马斯卡廷参加茶叙会见老友，而且在离开前还现场观看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这种“美国式”的宣传方式直接增进了美国社会对中国未来领导人个人的好感，堪与邓小平戴着牛仔帽访美相提并论。^[5]

尽管此行在个人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成功，然而美国普遍认为此行缺少实质性的内容。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批评中国领导人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会面尽是

[1] “外交部：太平洋足够宽广 容得下中美共存与合作”，中新社，2011年12月18日。

[2]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1-8页。

[3] “Mitt Romney Delivers Remarks on U.S. Foreign Policy”，Mitt Romney Centre October 7, 2011.

[4] “习近平：中美关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中新社，2012年2月15日。

[5] “习近平离美前在洛杉矶现场观看NBA比赛”，凤凰网，2012年2月18日。

“浮华和仪式”，他声称为了促使中国让步将在当选后立即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1]甚至贝德也表示，尽管美国应当加强与中国领导人的沟通以明确自身意图，但是中国同样应当清楚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沮丧是认真的，绝不仅仅是“选举年”的缘故，而这次出访还算不上是中美关系的突破。^[2]简而言之，这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关系在美国人看来更多的是外交辞令，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按照已有框架和惯例来行动，但是中国方面却并不准备在具体的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因此，“欢迎中国崛起”和“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总是无法对接。就在不久后的3月1日，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就与俄罗斯、古巴等国一起再次就涉叙决议投了反对票，这甚至导致美方宣称中国的选择“违反了历史潮流”。^[3]

在关系冷淡的大背景下，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提法并没有在中美间落到实处。美方认为中方这一举动仅是策略性的，目的是确保国内领导权交接的顺利进行，平稳度过2月以来的国内风波。^[4]因此3月7日希拉里在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时在对“新型合作关系”进行回应的同时，强调中国不能为了“短期利益有选择地利用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做“有选择的利益攸关方”。^[5]

（二）中美战略互疑

中国主动与美国改善关系丝毫不代表中国准备在很多议题上满足美国的要求，尤其是经历了在利比亚的教训后，中国决心在叙利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2011年10月4日和2012年2月4日，中国和俄罗斯两次否决了涉叙的提案。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总共只行使过八次否决权，这尤其说明了中国毫不妥协的态度，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还特别表示行使否决权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体现。^[6]与此同时，3月16日朝鲜突然宣布将在4月份发射光明星三号以庆祝金日

[1] Hannah Beech, “Did America Bond with China’s Heir Apparent,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 *The Times*, February 17, 2012.

[2] Jeffrey Bader, “Rooting for China’s Xi”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14, 2012.

[3] “2012年3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年3月2日。

[4] Susan V. Lawrence and David MacDonald, “U.S.–China Relations: Policy Issue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2, 2012, p.2.

[5] “Secretary Clinton on 40 Years of U.S.–China Relations”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March 7, 2012.

[6] “8次行使否决权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12年2月8日。

成的诞辰，美国立即表示这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1]而在奥巴马大力倡导的首尔核峰会上，中美双方虽然就朝鲜问题进行了会谈，但是美方表示中方仅声明“对朝鲜的所作所为同样失望”^[2]。可以说，中美领导人的首尔会面也几乎没有推动中美关系改善。

4月10日起，中国和菲律宾围绕黄岩岛发生了严重的对峙事件。菲律宾海军在黄岩礁海域发现正在捕鱼的中国渔民并派出巡逻舰进行登船搜查。随后，两艘中国海监船赶到出事海域，阻止菲军方逮捕中国渔民，形成了双方舰船对峙。^[3]从5月9日起，除了继续增派船只外，中国还加大了对菲律宾的施压力度。国家质检总署以“质量原因”为由暂停了约1200个集装箱的运往中国的菲律宾香蕉。^[4]至5月23日，中方在黄岩礁区域活动的各类舰船已达到接近100艘。^[5]到6月对峙正式停止时，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已经获得了这一区域的实际控制权。对于菲律宾寻求国际干预尤其是拉拢美国的行为，中国政府也进行了多次警告并声明“让其他国家在主权问题上选边站……丝毫无助于当前事态的妥善解决”。^[6]

在这种气氛中，2012年5月3—4日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并不被看好。在经济对话中，中方和美方继续重申双方在知识产权、市场开放上的固有观点。而在战略对话中，中方代表、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是也特别强调了在人权方面中美两国存在着分歧，美国不应当用人权问题来干涉中国内政。^[7]但是正如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的那样，如果“把成功定义为在关键议题上达成重要妥协的话”，那么这次对话更接近失败。^[8]

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降温，“重返亚洲”的说法逐渐被“战略再平衡”所取代，新提法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改变亚太地区的“现状”，又强调美国将把更多的

[1] Jack Kim and Jeremy Laurence, “N.Korea’s Plan for Rocket Launch Stirs Regional Concern”, *The Reuters*, March 16, 2012.

[2] Carole Lee and Evan Ramstad, “Seoul Talks Offer U.S. an Opening on Pakist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6, 2012.

[3] Jason Miks, “China, Philippines in Stand off”, *The Diplomat*, April 11, 2012.

[4] Renato Cruz De Castro, “China’s Realpolitik Approach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e Case of the 2012 Scarborough Shoal Stand-Off”, “Manag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 CSIS, June 5~6, 2013.

[5] “菲律宾抗议中国在黄岩岛海域增派船只达97艘”，人民网，2012年5月23日。

[6] “2012年4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7] “戴秉国：中美讨论了人权问题 双方存在分歧”，凤凰网，2012年5月4日。

[8] Danielle Kurtzleben, “3 Hurdles to U.S.-China Economic Dialogue”, *US News*, May 1, 2012.

军事和经济资源转移到东亚地区。^[1]在5月份,美国“日常性”地发布《涉华人权报告》、《涉华军事与安全报告》,美众议院还正式通过包括对台出售F16C/D型战斗机在内的《国防授权法案》。到了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又在香格里拉防长对话上具体表示美国将在未来八年内将10%的舰船转移到太平洋,在2020年前使得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军力达到美国海军全部实力的60%。相对地,中国则不仅降低了代表团的规格,还通过外交部表示美方突出军事议题、加强军事同盟的做法“不合时宜”。^[2]同时,还设立了统一管理西沙、南沙和中沙群岛的三沙市以增强对南海地区的实际管理。^[3]

实际上,在两国都强调“合作与友好”的姿态下,两国由各种分歧而产生的不信任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一些微小事件都能掀起波澜。比如6月1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发布了关于PM2.5污染情况的空气状况报告,这先是引起了上海市环保局和国家环保部“不符合国际公约和中国的相关法规”的抗议,^[4]五天后甚至外交部也开始表示美国大使馆的做法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有关规定。^[5]而美国媒体对此则认为中国的做法反而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6]事实上,这一事件也是双方“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的极佳注脚。由于双方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匹配——中方总是试图先固定地确定双方的关系,而美方则要求先在军事透明、科技产权、市场开放等具体问题进行合作,这一差异已经严重影响了相互间的信任。^[7]

(三) 日本“购岛”风波的冲击

从2012年4月17日开始,由石原慎太郎控制的东京都政府就为购买钓鱼岛

[1] Richard Weitz, “Pivot Out, Rebalance In”, *The Diplomat*, May 3, 2012.

[2] “2012年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举行例行记者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2年6月4日。

[3] “2012年6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2年6月21日。

[4] “PM2.5数据:环保部门为何和美国使馆‘打架’”, 《中国青年报》, 2012年6月6日。

[5] “2012年6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举行例行记者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2年6月6日。

[6] Susan Shirk and Steven Oliver, “China Has No Good Answer to the U.S. Embassy Pollution-Monitoring”, *The Atlantic*, June 13, 2012.

[7] Wang Jisi and Kenneth G. Lieberthal,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March 2012.

而进行了各种动作。^[1]但是考虑到石原的一贯右翼立场，这一做法也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然而7月7日，民主党首相野田佳彦却突然宣布为了实现“对钓鱼岛的稳定管理”，日本政府正在对购买和国有化岛屿进行研究。对此，中国外交部立即做出了反应，表示“中国神圣的领土决不允许任何人拿来买卖”。^[2]日本政府也立即向美中两国做出了解释，表示其目的是抢在东京都政府前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以防止石原进一步利用钓鱼岛引发局势动荡。^[3]

中方对这一说法深表怀疑，而美国政策界则普遍认为这一说辞仅仅反映了部分动机，更深刻的原因则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需要“时不我待”地抢先在钓鱼岛创造日本管辖的“现状”。^[4]考虑到中国必将做出强烈反应，坎贝尔也向野田政府表示过“强烈建议不要沿着这一方向（购岛）行动”，但是日本则坚持认为中国会接受这一理由。^[5]

与此同时，围绕南海问题的斗争也陷入了白热化。在7月9—13日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菲律宾和越南政府要求在联合公报中加入关于南海争端的内容并且得到了不少东盟国家的支持，而由于会议主席国柬埔寨坚决支持中国的立场，最终导致东盟成立45年来第一次未能发布联合公报。除了菲律宾、越南等当事国外，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对东盟未能对“近在咫尺”的事务“说点什么”表示不满。

除此之外，7月19日中国和俄罗斯再次否决了制裁阿萨德政权的联合国提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赖斯表示这是安理会“彻底的失败”。^[6]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对于以“人权”为名义的干预行动更加敏感、抵制也更加坚决，而美国却在阿拉伯之春后越来越重视“人权外交”。在7月23—24日的中美第17次人权对话上，美国助理国务卿波斯纳甚至公开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不断恶化。^[7]

[1] “2012年6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年6月26日。

[2]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就日本政府拟‘购买’钓鱼岛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年7月7日。

[3] Stephen Harner, “The Japan-China Territorial Dispute Is Serious, and Escalating”, *Forbes News*, July 17, 2012.

[4] Zachary Keck,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The Diplomat*, July 10, 2013.

[5] “U.S. Warned Government Against Buying Senkaku Islands: Campbell”, *Japan Times*, April 10, 2013.

[6] Michelle Nichols, “Russia, China Veto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on Syria”, *The Reuters*, July 19, 2012.

[7] Michael H. Posner, “Briefing on the 17th U.S.–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5, 2012.

不过，奥巴马政府由于本国大选和叙利亚问题一直没有足够的精力来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因为要参加民主党选前代表大会而缺席 APEC 论坛。^[1]因此直到 8 月 3 日，美国国务院才在中菲两国对峙已经结束半个月、东盟峰会未能发表联合公报半个月后，发表了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点名指责中国。这种滞后的做法也被戏称为“重新加入”南海问题。^[2]而中国对此则表现出了极为严厉的态度，8 月 4 日外交部表示美国的声明“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对于其他国家的错误行为视而不见，严重违背了美国自身宣称的对领土争端“不持立场”的宣示。^[3]

不过很快，日本就成为了与中国矛盾最激烈的国家。尽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 9 月 9 日在海参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告诫野田佳彦“应当充分认识到钓鱼岛事态的严重性”、日本任何方式的“购岛”都是非法和无效的，^[4]然而日本政府依然不顾中国的严正警告和美国的谨慎立场，在 9 月 10 日正式宣布将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中国则在当天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与日本政府间的互相谅解和在领土问题上的自我克制，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作为报复。^[5]四天后，中国政府一次性派遣了六艘海监船赴钓鱼岛海域巡航，完全突破了中国在该问题上的传统立场，也打破了此前只有日本单方面对钓鱼岛进行行政管辖的现状。^[6]日本的“购岛”甚至使得美国受到了“池鱼之殃”：由于中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偏袒日本”，9 月 20 日骆家辉在美国使馆附近甚至受到了示威人群的冲击。^[7]

这也使得钓鱼岛问题不得不成为 9 月中旬帕内塔中国之旅的重要议题之一，而其原本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继续澄清“亚太再平衡”并非针对中国并继续高层军事交流的势头。^[8]虽然在北京的招待会上，帕内塔仅表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

[1] “白宫宣布希拉里将代表美国出席 APEC 峰会”，中国新闻网，2012 年 5 月 24 日。

[2] Zachary Keck, “China and America’s Dueling South China Sea Statements”, *The Diplomat*, August 7, 2012.

[3]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美国国务院发表所谓南海问题声明阐明中方严正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 年 8 月 4 日。

[4] “胡锦涛向野田表明立场：日须充分认识事态严重性”，凤凰网，2012 年 9 月 9 日。

[5] Mure Dickie and Kathrin Hille, “Japan Risks China’s Wrath over Senkaku”, *Th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0, 2012.

[6] “2012 年 9 月 14 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 年 9 月 14 日。

[7] “China Probes Attack on US Ambassador’s Car”, *The Telegraph*, September 20, 2012.

[8] “国防部：欢迎帕内塔访华 已就亚太战略调整进行沟通”，《环球时报》，2012 年 8 月 30 日。

“不持立场”，并没有公开宣布美国的政策实质。^[1]但是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帕内塔其实已经声明由于日本实际管辖着钓鱼岛，因此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2]而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在参议院作证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3]简而言之，在钓鱼岛争端爆发之后，美国实际上已经迅速采取了一种支持日本的政策。

然而，中国和日本两国对于美国的态度都不满意，前者希望美国真正在钓鱼岛问题上彻底保持中立，而后者则希望美国要进一步表示支持日本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且发出明确支持日本的信号。在美国看来，其要在中日之间保持“平衡”非常困难。^[4]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其也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美国“在钓鱼岛事态上采取貌似公允的立场，实则明显偏袒日本”。在中国看来，帕内塔所表达的“不持立场”和“适用于安保条约”这两条原则根本上是矛盾的，甚至其本意就是要继续挑起和保持中日之间的争端。而在这一派观点看来，中日、中菲以及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间愈显激烈的矛盾都和美方的“挑拨离间”脱不了干系，其根源正是后者企图“坐收渔利”。^[5]

（四）领导层更替前后的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在9月份的表态由于过于偏向日本而遭到了来自国内的批评，因此在大选前其亚洲政策也显得更加谨慎。10月14—20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接连访问日本、韩国、中国、缅甸和印度，在访问中其表示美国不会当中日间的调停人，也不再明确回答钓鱼岛是否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而是用“不回答假设性问题”为托辞来回避矛盾。^[6]不过，10月23日在旧金山举行的第四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中，坎贝尔仍向中方代表崔天凯再次表示美国对日本负有义务，而中国的反制行动“损害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可避免地中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希望在美国大选和中国领导权交接前将保持局势稳定作为第一要

[1] “美防长帕内塔重申对钓鱼岛之争‘不持立场’”，《环球时报》，2012年9月20日。

[2]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E. Panetta Holds a Press Briefing En Route to Tokyo”，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transcript, 15 September 2012.

[3] Paul Eckert, “Treaty with Japan Covers Islets in China Spat: U.S. Official”，*Reuters*, September 20, 2012.

[4] Bonnie S. Glaser, “US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Crisis”，in *Tensions in the East China Sea*,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December 2013, p.30.

[5] 贾秀东：“帕内塔访华留下三大疑问”，《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第39期，第59页。

[6] 贾秀东：“美国大选前的伯恩斯亚洲之行”，《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第43期，第59页。

务。^[1]这也表明美国的“谨言慎行”并非是立场发生了变化，而更多是为大选做出的暂时策略性权衡。最终，奥巴马如愿赢得了2012年美国大选的胜利，这也意味着东亚政策很可能将在现有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下去。^[2]

在再次当选后不到两周，成功连任的奥巴马就从11月18日起带着“胜利光环”展开了泰国、缅甸、柬埔寨三国的“凯旋之旅”，其中缅甸和柬埔寨在此之前都没有任何美国总统到访过，尤其是前者在2012年7月才刚刚恢复了与美国的邦交。奥巴马在仰光会见了缅甸领导人吴登盛以及被解禁的昂山素季，呼吁缅甸进一步进行民主化改革。^[3]而在随后对柬埔寨的访问中，奥巴马则更多地表现出对柬埔寨首相洪森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态度，在争取外交突破的同时施加压力，促使其成为第二个“缅甸”。^[4]奥巴马的这一出行被普遍视为美国在进一步展示“重返亚洲”政策的决心，尤其是对缅柬两国的访问更被看作直接与中国的“软实力”竞争。

就在此前一周，中国共产党也刚刚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1月15日正式产生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随后，即将离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带团前往金边参加第21届东盟峰会和第七届东亚峰会。在此次东亚峰会上，中国在双边和多边的外交中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及其亚洲伙伴国的压力。事实上，在东亚峰会召开之后，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由于美国在大选后重新“无所顾忌”而变得更加紧张。^[5]

更明显的信号是，就在东亚峰会结束后不到十天美国再次在钓鱼岛是否适用于日美条约问题上明确了立场。11月30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在201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确认日本实际管辖钓鱼岛、第三方的任何行动都不影响日本的实际管辖权，并且所有日本管辖的地区都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除此以外，该法案还宽泛地反对任何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解

[1] Bonnie S. Glaser, “US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Crisis”, in *Tensions in the East China Sea*,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December 2013, p.29.

[2] 周琪：“奥巴马连任后的美国内外政策评估”，《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

[3] Matt Spetalnick and Jeff Mason, “Obama’s Visit to Myanmar Marks ‘New Chapter’ in US-Myanmar Relation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19, 2012.

[4] Julie Pace, “Obama in Cambodia Makes History as First US President to Visit Country”, *The Huffington Post*, November 19, 2012.

[5] Ben Bland and Geoff Dyer, “Tensions Run High as East Asia Summit End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0, 2012.

决领土争端。^[1]而且，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菲律宾和日本两国也开始走向联合，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甚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欢迎日本重整军备、制衡崛起中的中国。^[2]

在这种环境中，中方一方面希望能够抓住机会改善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其他方面打开外交局面，缓解外部压力。对于奥巴马连任后美国继续执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首先表示愿意看到美国建设性地参与亚太事务，尤其是进行经济合作。^[3]其次，中国将建立与发达国家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写入了十八大报告，在最高层次上确定了要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的总体战略。^[4]这也使得主动寻求建立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了中国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主要外交目标，然而由于2009年以来的几番波折，这一构想距离真正实现还相去甚远。

结 语

2009年初—2012年底，中美关系展现出了明显的“高开低走”的轨迹，最终造成了中美“战略互疑”，双方都多次宣示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现实又总似乎在往相反方向发展。尽管2012年底是本文的终点，但是从之后的事态发展来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谋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远非一帆风顺，“美国梦”与“中国梦”依然未能实现对接，中美之间竭力避免形成“冷战”的愿望和当前东亚地区内已经出现军备竞赛苗头的现实之间也存在较大落差。

对美国来说，中国对它构成的挑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1945年后成为世界体系霸主之后其既应对过苏联在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也应对过日本在经济上造成的压力，其对中国采取的“两面下注”政策很容易从以往历史中汲取经验。美国对过去的学习和模仿虽然有时会失之于“类比不当”，甚至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但援引旧例对美国决策者来说仍然是“虽非最佳，亦非最坏”。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当好世界第二”则完全是一个新问题，锋芒毕

[1] “US Approves Amendment Backing Japanese Claims”, *Taipei Times*, December 2, 2012.

[2] “2012年12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年12月10日。

[3] “2012年11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年11月19日。

[4] 钟声：“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

露地提倡“霸权的衰落”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事事遵循并不完全公平的“国际准则”却又心有不甘。甚至于有观点认为，在小布什任期内良好的中美关系的形成实属9·11事件带来的美国“战略分心”的副产品，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外交环境已经可以称之为“迟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关系尤其是中国面临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从微观上来说，这四年中中美关系新出现的问题要多于解决的部分。在经济层面上，中美仅仅在人民币汇率和与其紧密相关的双边贸易平衡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中国愿意用提高人民币汇率的方式来促进国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但是除此之外，中美在2012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很大程度上仍然在重复四年前的相同问题，中国抱怨美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而美国指责中国的投资市场没有充分开放，比较明显的变化可能是中美两国围绕知识产权、网络自由和安全等新问题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政治领域则更是如此，中方在此期间一直试图通过在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的努力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是在原本成效就不明显的新问题不断浮现，尤其是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中美两国很难在现有的立场上协调各自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关系之所以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四年中呈现恶化的态势不是因为双方的“战略定位”不高远，而是因为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很多具体问题。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总体特征就是美中两国矛盾不断发酵，双方之间的防备不断加深。

宏观上看，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美国要维持其霸权和领导地位，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并且在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方面创造新规则来“矫正”国家间行为，而这些新旧的规则无法与中国既有的发展状况和方向“兼容”，这些规则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和安全上的。奥巴马政府在第一年积极接触中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之后，对于中国转而采取了一种“消极应对、全面准备”的总体政策，既不明确地提出遏制中国，也对于主动同中国改善关系兴趣索然，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国周边全面采取措施，保证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会在未来被排除出东亚。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会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背景。■